

# 歷史連續性與 二十世紀中國的政治空間

• 西村成雄

今天，當我們回首省視二十世紀中國的時候，為甚麼要強調歷史的連續性？因為在以往的觀念中，二十世紀中國的歷史曾被認為是一直處於變動而沒有連續性的過程中的。1949年的中國革命，即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無疑是促使這一歷史意識的重要事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後的歷史被認為是斷裂而無連續性的，被截然劃分「解放前與解放後」或「黑暗與光明」，可說即出自這樣的錯覺。

與此相反，本文擬把中國的政治空間置於「二十世紀」這一比較長的歷史時段和語境中，從歷史連續性的視角加以考察<sup>①</sup>。筆者曾指出，無論是二十世紀的前半期還是後半期，始終有一個連綿不斷、貫穿中國政治空間的深層底流。這個底流是指從十九世紀末開始的以創建國民國家(nation state)為目標的思想和運動。然而在同一空間裏，也存在繼承傳統中華世界的政治潮流<sup>②</sup>。這兩種凝聚力量相互交織滲透，影響了二十世紀中國的歷史，也制約着中國的未來走向。

二十世紀始終有一個連綿不斷、貫穿中國政治空間的深層底流。這個底流是指從十九世紀末開始的以創建國民國家為目標的思想和運動。然而在同一空間裏，也存在繼承傳統中華世界的政治潮流。這兩種凝聚力量相互交織滲透，影響了二十世紀中國的歷史，也制約着中國的未來走向。

## 一 二十世紀中國政治空間與國民國家的凝聚 ——國民國家的民族主義之歷史連續性

二十世紀前半期，日本對中國形象的認識，基本根植於「中國政治空間不可能存在向國民國家凝聚的潮流」這樣的判斷<sup>③</sup>。可是，進入二十世紀後半期，情況卻為之一變，認為中國突然形成了一個堅固的「社會主義國民國家」。近代日本對中國歷史的無連續性印象，在這裏顯露無遺。

從政治權力的變動看，二十世紀後期的中國與1949年前的不同，無疑是一個「新中國」。但是，如果從國民國家凝聚過程考察，社會主義國家其實只是這個過程的一個階段。如果考察整個二十世紀，就可知道中國社會的政治凝聚並不是在二十世紀後半期才突然形成的，而是早在二十世紀前半期就已經開始，其中包含着曲折的歷史過程。

那麼，中國國民國家凝聚性的發展究竟經歷了怎樣的歷史階段呢<sup>④</sup>？

二十世紀的清朝只不過佔了其中的短短10年，但從政治變動的角度看，這一期間發生了可以看作戊戌變法延續的新政、憲政改革等等，它們皆可視為清政府試圖在中華帝國內達到國民國家凝聚的一種嘗試。這是二十世紀中國歷史的第一階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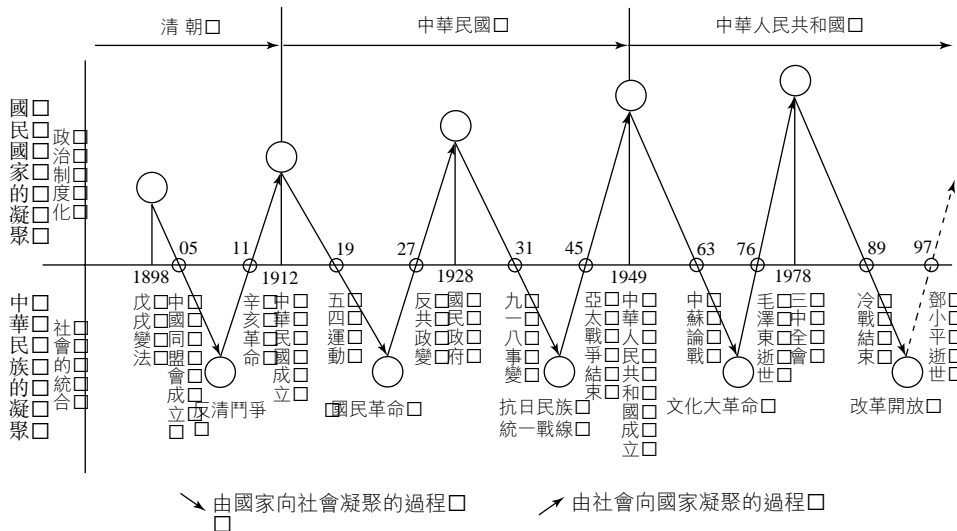
如果從國家權力交替的角度劃分二十世紀中國的政治史，我們可以將之分為清朝、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三個階段，而二十世紀的清朝只不過佔了其中的短短10年，但從政治變動的角度看，這一期間發生了可以看作是戊戌變法延續的新政、憲政改革等等，它們皆可視為清政府試圖在中華帝國內達到國民國家凝聚的一種嘗試。這是二十世紀中國歷史的第一階段。

中華民國時期，又可細分為北洋軍閥等執政的北京政府的16年(1912-28)和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政府的21年(1928-49)兩個階段。最近的研究已經逐步證實，袁世凱及其後繼者的政權雖然是軍閥權力，但在政治、經濟及社會諸方面，都曾相當深廣地推進了「近代化」。而20年代中期的國民革命則恰是國民國家形成的一個階段，可以把它稱為走向國民國家的政治凝聚過程。作為經濟上的凝聚，北京政府的16年，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為進口替代工業積蓄了許多前提，在其後的國民政府階段，則接續上了第一次進口替代的工業化政策(輕工業部門)。目前許多有關民國時期的經濟研究，證明了當時在中國的經濟空間內，資本主義的凝聚已達到一定水準。在國民政府時期，從國民政府政治體制的形成和發展看，我們不應將其性質視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權力」，而必須看到，「國民主權」在以立憲共和為目標的「訓政體制」裏雖然只是形式，但它畢竟意味着承認「國民主權」體制的出現，這顯示了近代中國要求國民主權的民主主義政治舞台逐漸形成。此外，從國際形象看，在抗日戰爭期間，特別是太平洋戰爭以後，中國作為具有主權的國民國家而與英美蘇並列，作為聯合國發起國家的一員而獲得了大國的地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中國的這種國際地位被繼承下來。從二十世紀史的視點看，可以把中華民國時期的北京政府時期視為繼戊戌變法後的第二階段，國民政府時期則為第三階段<sup>⑥</sup>。

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可以分為毛澤東的30年(1949-78)和鄧小平的18年(1979-97)<sup>⑦</sup>，而鄧的18年至今仍在繼續。確如毛澤東所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標誌着新民主主義國家的誕生，但「向蘇聯一邊倒」的政策，表明中國成了社會主義國民國家體系的一員，並一舉走向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方向。這同時也意味着，中國退出了國民政府時期已經進入的資本主義國民國家體系，並在政治上脫離了世界資本主義體制。在此基礎上，通過在經濟上推進國家資本主導型的計劃經濟，實現了重工業的第二次進口替代工業化。也就在這一時期，中國提出了改變從屬蘇聯、提高在社會主義陣營內政治地位的方針。經過中蘇論戰以及成功開發核武器，毛澤東獨具特色的中國社會主義路線幾乎達到了目的。但毛澤東晚年發動「文化大革命」，以致對內對外都放棄了國民國家的理論，而周恩來和鄧小平則努力縮小這種矛盾並爭取保住中國的國際地位。文革中期，毛澤東也贊同中國恢復聯合國的席位。周恩來等人堅持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便是中國重返國民國家的國際規則的象徵。自毛澤東去世後，特別是1978年末中共三中全會以後，中國主動加入國際經濟體系，逐步進入以發展經濟為目標的階段。在二十世紀的中國歷史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是第四階段，而鄧小平的18年和後鄧時代的今天則可以視為第五階段。在第五階段，中國完成了由國家資本主導向民間資本主導轉換的經濟改革，這種發展的方向已經無可逆轉。可以預測，今後在展望二十一世紀的時候，把中國作為國民國家放在世界範圍內分析肯定會愈加增多。

當我們把二十世紀中國社會的底流劃分為國民國家凝聚的幾個階段的時候，可以看到一個歷史的連續性。如果在中國的語境裏表述這個連續性，則只能概括為「救國」的意識形態。這是一個如何在傳統中華世界內凝聚成「國民國家」的課題，是國家權力與政權在各個階段凝聚的過程，也是以最廣泛的意識形態為基礎的國民國家的民族主義在政治空間的表現過程。

圖1 二十世紀中國國民國家凝聚的五個階段



資料來源：根據拙著《中國的民族主義與民主主義》(東京：研文出版，1991)，頁42圖修改。

## 二 二十世紀中國政治空間與中華民族的凝聚 ——中華民族主義的歷史連續性和新的要素

如前所述，在二十世紀的中國政治空間裏，不僅存在國民國家的凝聚，還存在中華民族的凝聚。而後者則應該理解為傳統中華世界的延伸和衍變。

如果說「中華思想」是二十世紀以前中華世界的凝聚基礎，那麼二十世紀中華世界的凝聚基礎則是「中華民族」思想。二十世紀以前，在以「中華思想」為意識形態基礎的中華世界形成了中華帝國這個政治實體。距離二十世紀最近的「大清帝國」，擁有中華帝國歷史上最大的版圖。如何把握和評價清朝史無前例的政治大一統，不僅對研究清史，而且對理解中國也有直接影響。在現階段中國關於「統一和分裂」的論述中，「統一」論是主流；這種論說是把「統一」視為孕育「盛世」的源泉，並以中華世界的「大一統」思想為前提。而在現代中國政治家的意識中，也把清朝的版圖作為中華世界來考慮的。1961年周恩來會見溥儀時說過：「清朝在確定版圖，增加人口和促進文化發展等三個方面做了好事。」同一文獻還說到清朝「統一了中國眾多的兄弟民族」，可見中國作為多民族國家的意識直接淵源於清代⑦。

恰恰就在這盛世之後，十九世紀的西歐世界蠶食了中華帝國，即清朝的周邊部分，以致在二十世紀前夜落到被包括日本在內的近代國家侵略的地步。於是，從何處獲得可以與列強抗衡的能量和意識形態，便成為二十世紀中國政治家最關注的問題。中華帝國陷入如此境地，不僅失去了它的屬國(有冊封朝貢關

當我們把二十世紀中國社會的底流劃分為國民國家凝聚的幾個階段的時候，可以看到一個歷史的連續性。如果在中國的語境裏表述這個連續性，則只能概括為「救國」的意識形態。如果說「中華思想」是二十世紀以前中華世界的凝聚基礎，那麼二十世紀中華世界的凝聚基礎則是「中華民族」思想。

係的周邊各國)，而且不得不允許列強在內河沿岸開闢租界，甚至連中華世界的存亡都受到威脅。這種日益增強的危機感，使得努力「恢復中華世界的願望」漸漸凝聚成一種意識形態，即所謂的「救亡」論。「中華民族」這一概念始於二十世紀初期，中華民國的「五族共和」幾乎原封不動地繼承了清朝的多民族構成。後來，當日本提出「對華二十一條」要求（尤其是「九一八」事變侵略中國以後），「救亡」論在中國更獲得了政治話語的意義。在這裏，我們把二十世紀由恢復中華世界的願望而產生的凝聚稱為「中華民族主義」。那麼，中華民族主義經過了哪些階段而得以延續下來呢？

表1 二十世紀中國「中華民族」危機意識的四個階段

		起點	高揚期
第一階段	1915年	對華二十一條要求	五四運動 國民革命
第二階段	1931年	滿洲事變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第三階段	1963年	中蘇論戰	文化大革命
第四階段	1989年	冷戰結束	改革開放第二階段

如圖1和表1所示，中華民族主義表現在國民國家的民族主義政治凝聚五個階段中。但在辛亥革命前夕，漢民族的反清意識形態成為中心，比中華民族論更突出，故應將這一階段排除在外。於是，第一階段是在中華民國北京政府主政的時段內，以抵抗日本的「二十一條」要求為起點，中經拒簽條約的五四運動高揚期，直至20年代中期的國民革命。這一時期的中華民族主義，集中表現為如何阻止包括日本在內的列強侵略。但反帝後來發展為反抗與帝國主義勾結的國內「軍閥政權」，最後凝聚為「反帝反軍閥」意識。這一時期圍繞國內政治權力的矛盾，產生了實現國民國家的政治凝聚物，即打倒北京軍閥政權和建立國民政府。

第二階段，國民政府主導的時段內，1931年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引發了廣泛的救亡圖存運動，而以1936年的西安事變為轉機，國民黨的國民政府明顯轉向抗日，1937年的盧溝橋事件以後則舉起「抗戰建國」旗幟，終於在1945年取得勝利。在這一階段裏，國民政府要全面抗日（這是中華民族主義的課題），同時又要實現「建國」（這是國民國家的民族主義課題），國民政府肩負着雙重課題。與此相對，中國共產黨則舉起全民徹底抗戰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旗幟，在這一戰線中重建「抗日政權」。抗日戰爭時期，作為政治話語的中華民族主義發揮了決定性的功能，而只有順應這一潮流的政治勢力，才能在1945年後圍繞國內政治權力展開的民主主義運動和武裝鬥爭中獲得主動。從這一意義上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在高揚中華民族主義中誕生的。

第三階段，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以中蘇論戰為起點，到「文化大革命」進入高揚期，結束於1971年恢復聯合國席位。當時的國際政治處於戰後冷戰時期，但中國共產黨有意與冷戰格局拉開一定距離，特別是在與蘇共的關係上，要求變從屬地位為對等的立場；在國家關係上也謀求提高在社會主義陣營的地位。1964年核試驗的成功無疑促進了這種傾向。中國對蘇的整體離心力增大，表面上表現為解釋馬列主義的正統性的矛盾，隱蔽其後的根源則是以毛澤東思想為根基的中華民族主義。「文化大革命」是集其總成，對內，把毛澤東的個人

十九世紀的西歐世界蠶食了中華帝國，於是，從何處獲得可以與列強抗衡的能量和意識形態，便成為二十世紀中國政治家最關注的問題。在這裏，我們把二十世紀由恢復中華世界的願望而產生的凝聚稱為「中華民族主義」。

崇拜擴及到政治、經濟、社會、意識形態的所有空間，並試圖將其制度化。對外，則把毛澤東思想視作全世界的普遍準則，甚至在國家關係上也推行了「造反外交」，從而放棄了國民國家的邏輯。但是，在二十世紀世界外交關係上，這種邏輯最終是無法實現的。1971年中國恢復聯合國席位，1972年恢復了中美、中日關係都是某種重大轉變的開始。從毛澤東逝世後至1978年底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止，中國政府開始用正視現實的思維邏輯處理國內外各種局面。中國的自我認識，從原來的「中國的世界」轉變為「世界中的中國」。

第四階段，從冷戰結束開始，中經鄧小平掌握實權的10年，再到1989年以後，特別是鄧在1992年「南巡講話」以後，中國實際進入後鄧時代，直至今日。在這一階段裏，中國新一代的政治家已經不可能再像鄧小平那樣發揮權威領導人的影響力，作為個人影響力的補充，他們有意激起存在於中國人民意識深層的某些中華民族主義，藉以支持自己政治統治的正統性。而「愛國主義」之所以被強調，理由也正在於此。在這種「官定」的愛國主義理論中，所謂的「國」很明顯是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為特定前提的，但其中也包含中華民族這一抽象層次的訴求。其實早在三中全會上呼籲台灣統一的時候，便已經提出中華民族一體論。其後，1984年圍繞香港回歸又提出「一國兩制」的彈性政治選擇。從這一意義上確實可以說，從鄧小平時代的初期開始，不僅對內提倡中華民族主義，而且，通過「懲罰」越南和「收回香港」，有效地利用傳統中華世界的影響力，其社會基礎則是「鄧小平的18年」經濟發展的社會受益階層。但另一方面，若不順應「世界中的中國」的邏輯，經濟是難以發展的。於是在後冷戰時期國內、國際形勢複雜交錯的局面中，中華民族主義邏輯和國民國家的民族主義邏輯之間呈現出相當複雜的關係。

### 三 現代中國多重複合的政治空間

以往的研究大都認為，二十世紀中國社會的「救亡圖存」、「救亡救國」等論述，其意涵是拯救中華民族。但是，這些論述的內容還可以有其他解釋。第一，「救亡」可以理解為以恢復傳統中華世界為基礎的意識形態；而作為意識形態的「圖存」和「救國」，則是指中國社會在二十世紀必須凝聚成近代國民國家才能生存。「救亡圖存」、「救亡救國」等論述，可以理解為這兩種意識形態的混合，它是貫穿二十世紀中國的雙重政治動機。更進一步區分，二十世紀前半後半兩個階段的「救國」意識形態的內涵也有不同。二十世紀前半期，是中國實現資本主義國民國家體系自我凝聚和謀求加入這一體系的時期；二十世紀後半期，則是中國實現社會主義國民國家凝聚並謀求加入這一體系的時期。在這一意義上，二十世紀中國社會的「救國」意識形態既包括資本主義國民國家的邏輯，也包括社會主義國民國家的邏輯。但不管是上述的那一種邏輯，都與二十世紀中華民族的邏輯結合，共同構成複合的政治空間。

從這樣的視角看，現今中國的複合政治空間具有怎樣的特點呢？如果我們把現今的中國理解為是指從1976年毛澤東去世到1997年鄧小平去世這一段時期的話，那麼可以看到，在政治空間裏維持「社會主義」，在經濟空間裏導入「市場經濟」，在社會空間裏存在着某種「動盪」，這些因素和意識形態空間裏的「社會主義與民族主義」相結合，構成了這一時期的特徵。其中，在與世界經濟接軌的

以往的研究大都認為，二十世紀中國社會的「救亡圖存」、「救亡救國」等論述，其意涵是拯救中華民族。但是，這些論述的內容還可以有其他解釋。二十世紀中國社會的「救國」意識形態既包括資本主義國民國家的邏輯，也包括社會主義國民國家的邏輯。但不管是上述的那一種邏輯，都與二十世紀中華民族的邏輯結合，共同構成複合的政治空間。

經濟發展過程中不斷增強其自身的凝聚力，但同時也積蓄了與社會主義政治空間的矛盾。雖然如此，其作為國民國家的凝聚性還是在不斷強化。例如，當前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狀態的加劇，市場經濟和「國有企業」矛盾的增加，貧富差距的拉大，其實都是基礎經濟水準提高後的結果，而這經濟的凝聚力，是中國作為「國民國家」立足於國際社會的政治支撐。當然，這些矛盾的增大會動搖中國社會的整體現實，醞釀某種社會危機。但問題的關鍵在於應該怎樣定量分析這「動盪」的幅度、危機，或者所謂「動亂」的程度。

通過上述對二十世紀中國政治空間的特徵的分析，似乎有必要從這一視角重新考察現代中國政治空間的複合性質。在這一意義上，現代中國存在三個相互重合但又可以區分的政治空間：作為社會主義國民國家的空間，作為實際的國民國家統治能力不斷增強的空間，以及仍在發揮作用的中華民族邏輯的空間。在這裏，第一個政治空間是以自50年代組織起來的國有國營企業為主幹的社會主義經濟；至於第二個政治空間是以1979年改革開放中形成的市場經濟空間為基礎的，也就是所謂「適應現實」的政治空間；第三個政治空間則是被排除於上述兩個空間之外的「傳統經濟空間」。現在，第一空間由於第二空間的膨脹而不斷被迫修正與毛澤東時代不同的社會主義。第三空間則因填補第一空間變化帶來的政治空隙，並與第二空間和諧互動而開始膨脹起來。而最大的矛盾，是第一空間和第二空間裏各種意識形態化的「觀點對立」的表面化。比如，第一空間的代表性觀點「均富論」、「中央集權論」、「權威主義體制論」等，和第二空間的代表性觀點「先富論」、「地方分權論」、「強化人大論」，都包含着許多相互對立的內容。當然，一個人物可能同時具有兩個空間交叉形成的意識形態，從鄧小平身上就可以看到這樣的特徵：他在政治方面雖然主張中央集權，但經濟方面卻主張「先富論」。但正如天安門事件所象徵的那樣，即使擁有鄧小平那樣的政治權力和權威，也還是未能避免因這兩個政治空間的矛盾所導致的社會衝突。

在此可以推斷的是，關於「愛國主義」的話語將越來越發被高揚。1978年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對台灣明確提出統一的呼籲，1984年與英國簽署的恢復行使香港主權的協定，為這種「愛國主義論」的提倡提供了契機。進入90年代，這種「愛國主義論」更被賦予了新的意義。在這裏，向第三空間亦即中華民族世界的凝聚，必然會作為一種政治資源而被動員起來。也就是說，「中華民族主義」的政治空間，作為緩和第一和第二空間矛盾激化的意識形態被創造了出來。並且，這種「中華民族主義」，對於掩飾在「先富論」形態的經濟發展中必然產生並不斷擴大的地域落差，具有一定的作用；特別是對於經濟貧困的少數民族地區日益政治化的「民族問題」，也可發揮一定的對症治療功能。不必說，現實存在的政治離心力，制約着這種功能的充分發揮。但是，由此在調整上述第一、第二空間矛盾的新的意識形態尚未誕生之前，除了動員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利用歷史空間裏積蓄的政治資源以外，別無他法。

但從本文的論述脈絡而言，第一、第二空間並不僅僅是對立的，它們還擁有共同的國民國家的理論基礎。注意到這一點是非常必要的。正當社會主義經濟空間的根基國有企業不得不改革，而代表第一空間的社會主義定義不得不變化的時候，在第二空間裏，適應市場經濟的政治多元化傾向的調整也已開始。應該說，在政治、經濟和意識形態等方面共同提高國民國家的凝聚力，是維持中國社會整體空間而普遍產生的共同動機。有必要指出，國民國家的政治話語

現代中國存在三個相互重合但又可以區分的政治空間：第一個政治空間是以自50年代組織起來的國有國營企業為主幹的社會主義經濟；第二個政治空間是以1979年改革開放中形成的市場經濟空間為基礎的，也就是所謂「適應現實」的政治空間；第三個政治空間則是被排除於上述兩個空間之外的「傳統經濟空間」。

不僅意味着國家主權的不可侵犯性，後者也是政治統治正統性的重要內容。國民主權能否成為政治正統性的支持，與政治統治的牢固程度密切相關。在這一點上，第一空間與第二空間都是共同的。而從這樣的視角看，中國自90年代上半期推進的農村基層政權的直接選舉，便不僅意味着農村政治空間形成新的凝聚力量，它亦可被視為開發國民國家統治能力的一個環節<sup>⑥</sup>。據有關資料顯示，1988年以來，中國大多數省份都實行了村委會的直接選舉，1991-92年間進行了兩次改選；1995-96年間，全國有24個省、市、自治區實施了改選，其中有15個省份為第三次改選，據說投票率均為90%。而1995年在吉林省梨樹縣成功施行的「海選」，亦即由農民推舉候選人的預備選舉，在全國範圍內得到推廣。以往，村委會選舉基本是以村為單位，由中國共產黨的村支部或村民小組推舉候選人。現在的「海選」則意味着選舉透明度的空前增加。以往的記名投票改為無記名投票，並採用差額選舉方式。以村委會主任為例，兩位成為正式候選人者，要公開向村民發表「治村方針」，即做出公開承諾，這自然造成了這樣一種政治氣氛，即當選者必須負有兌現承諾的義務。梨樹縣全縣在第一次「海選」共選出25,536名候選人，佔全體有投票資格者總數的6.13%，村平均人數為76人。其後的第二次「海選」，候選人縮至2,933人，佔有投票資格者總數的0.7%，村平均人數為8.73人。在此基礎上，確定最終候選人，實施決選。這樣的選舉過程，確實顯示出了不同於以往農村基層社會政治空間的存在方式。可以說，為適應中國社會結構的變動，無論第一空間還是第二空間，都在試圖重新強化農村基層社會的政治凝聚力。確實，村民自治意識的新凝聚，是呼應近18年來農村經濟和社會諸種關係變動的政治性結果。但從另外的意義上，又確如梨樹縣民政局負責人所說：「如不推進農村的民主選舉，農村說不定會出現李自成。」正是感覺到上述危機，農村基層政權透過從上向下推行民主的直接選舉，試圖重新控制農村社會。由此，不能不說，90年代前半，我們目睹的中國社會大轉換的深層地帶，確保統治的正統性以及開發國家統治能力的過程，都在真實地展開着。

那麼，再從歷史的角度回顧一下，也同樣不無意義。

如果說1954年實施的全國性基層選舉是對共和國的成立和土地改革的政治追認，那麼現在的農村直接選舉則是對1978年以後的政治轉變和經濟改革的事後承認。在這一意義上，正是藉由新的凝聚力而逐漸形成的政治空間，在一定範圍內承擔着調整第一空間和第二空間矛盾的任務。

## 四 結語

本文嘗試從國民國家凝聚的過程重新組構二十世紀的中國政治空間，同時也考察了二十世紀中華世界的凝聚過程。自30年代前半期的「九一八」事變之後，後者的凝聚方式明顯表現為中華民族主義的定型過程。而在今天，與冷戰後複雜的國際條件相關聯，又顯露出重新凝聚的徵候。但也正因如此，區別和分析兩種不同的民族主義——即增強國民國家凝聚力的民族主義和增強中華民族凝聚力的民族主義——便顯得更重要。如果不能發現國民國家在現今中國社會中的凝聚過程，那麼除了「混亂」以外將一無所見，甚至會放棄定量分析，從而塑造出一個難以理解的中國形象。與此相反，如果過高評價中國的國民國家

如果過高評價中國的國民國家凝聚力，就會以為全國實現了均質統治，最終形成片面的中國印象。因此，分析支撐中華世界邏輯的歷史內涵，決不應無視其與作為二十世紀現象的「中華民族」觀念的結合。我想，這正是把「二十世紀的中國」作為認識現代中國的方法的意義所在。

凝聚力，就會以為全國實現了均質統治，最終形成片面的中國印象。關於中華民族的凝聚性，今天似乎已經沒有人會否定其在中國社會的存在，但在做定量分析時對其估計過高，則會脫離二十世紀的歷史條件，把中華民族的世界和「中華帝國」形象聯結在一起。因此，分析支撐中華世界邏輯的歷史內涵，決不應無視其與作為二十世紀現象的「中華民族」觀念的結合。我想，這正是把「二十世紀的中國」作為認識現代中國的方法的意義所在<sup>⑩</sup>。

### 註釋

① 當然，在中國、日本和歐美，批評與反省「現代化範式」的意見也已經出現。近期與歷史認識範式有關的代表性著述，可參見李澤厚、劉再復：《告別革命》（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7）。第三版增補有〈要改良，不要革命〉等七篇文章；Philip Huang（黃宗智），“The Paradigmatic Crisis in Chinese Studies: Paradoxes in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Modern China*, vol. 17, no. 3 (July 1991); Arif Dirlik, “Reversals, Ironies, Hegemonies: Notes on the Contemporary Historiography of Modern China”，*Modern China*, vol. 22, no. 3 (July 1996); Judith B. Farquhar, James L. Hevia, “Culture and Postwar American Historiography of China”，*positions*, vol. 1, no. 2 (Fall 1993)；山田辰雄編：《歷史過程中的中國》（東京：勁草書房，1996）；《中國領域研究系列：現代中國歷史的連續性與非連續性》，第3號（東京：日本文部省重點領域研究現代中國的結構變動，代表者：毛里和子）。

② 參照拙作：〈二十世紀中國的「國民國家」與社會主義〉，載歷史學研究會編：《質疑國民國家》（東京：青木書店，1994）；〈中國歷史空間的再認識與「世界體系」〉，載川北稔、鈴木正幸編：《歷史學與現在》（東京：柏書房，1995）。

③ 在20年代，最典型的觀點有矢野仁一：《近代支那論》（京都：弘文堂，1923），其中曾有這樣的論述：「支那不是近代的國家」（頁185），「支那自身不可能改變以往的世界帝國型的組織，建成近代的國家組織。支那只能滅亡」（頁118）。「九一八」事變後，這種觀點居於日本政府和軍部以及輿論論壇的主流，但在1936-37年初，出現了對其進行尖銳批判的「支那統一化論爭」，尾崎秀實、矢內原忠雄、中西功等提出必須關注中國社會中國國民國家和中華民族的凝聚力的主張。關於這次論爭的內容，可參照山口博一、野澤豐：《中國統一化論爭研究》（東京：亞洲經濟研究所，1971）和拙著：《中國近代東北地域史研究》（京都：法律文化社，1993）的序章。

④ 以下論點據拙著：《中國的民族主義與民主主義》（東京：研文出版，1991）；拙作：〈貫穿二十世紀的「國民國家」邏輯與民族主義·社會主義〉，《歷史評論》，515期，1993年3月。

⑤ 關於日本的中華民國研究動向，務請參照野澤豐編：《日本的中華民國史研究》（東京：汲古書院，1995）。作為政治史研究，則請參照橫山宏章：《中華民國史專制和民主的相礙》（東京：三一書房，1996）；《中國的政治危機與傳統統治帝國的瓦解與再興》（東京：研文出版，1996）。

⑥ 參見毛里和子：《現代中國的政治》（名古屋：名古屋大學出版會，1993）。

⑦ 王慶祥：《毛澤東周恩來與溥儀》（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⑧ 此處引用的資料主要參照王旭：〈鄉村中國的基層民主：國家與社會的權力互強〉，《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1997年4月號。但觀點是筆者本人的。另可參見何清漣：〈農村基層社會地方惡勢力的興起〉，《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1997年6月號。

⑨ 參見拙作：〈中國政治體制史論兩種「政黨國家」與「黨政關係」〉，載土屋健治編：《講座現代亞洲1 民族主義與國民國家》（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94）。

西村成雄 法學博士，日本國立大阪外國語大學教授。主要著述有《中國近代東北地域史研究》、《中國的民族主義與民主主義》、《張學良》。